



体育的仪式意义与社会功能

董国礼, 陆小聪

摘要: 以文献资料为基本素材讨论了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为体育的仪式意义, 该部分主要论述的人类学视野下的仪式以及体育仪式的象征意义, 如勇气、比赛精神、正直诚实等等; 二是体育的社会功能, 主要论述体育的社会整合、国家认同和国家自豪感等内容。

关键词: 体育; 仪式; 社会功能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207(2008)06-0063-04

Ritual Significance and Social Functions of Sports

DONG Guo-li, LU Xiao-cong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literature study, the paper focuses on two aspects. One is the ritual significance of sports, which includes the ritual in the eyes of anthropology and the symbolism of sport ritual such as gameness, competition spirit, integrity and so on. The second is the social functions of sports, which include social integrity, national identity, national pride, etc.

Key words: port; ritual; social function

体育运动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正在日益体现, 在北京举办的第29届奥运会之所以受到举世瞩目, 正是因为奥运会不单单是一个竞技选手之间身体能力的较量或展现, 它更是一种仪式化的活动, 承载了丰富而多样的社会功能。

1 社会人类学视野中的仪式

仪式是一种社会性质的行动, 任何人只要参与一个联合的公开行动, 就表示参与者接受了共同的社会道德秩序, 这种秩序超越了他们个人的地位。Leach认为仪式是人为的时间流, 人在这个时间流中转变自己的世俗地位和神圣地位: 从世俗地位改变为神圣地位, 在转变为世俗地位。整个流程分为4个阶段: 1) 分离, 一个道德人由世俗世界进入神圣世界; 2) 中介状况, 道德人处于神圣世界, 一个中空的状态, 日常社会时间完全停止; 3) 结合, 道德人从神圣再回到世俗世界, 世俗世界再重新开始; 4) 原来平常的世俗生活 (Leach, 1976)。Turner重视在中介阶段的仪式中, 人的属性及地位发生的转变。V. Turner认为所有的通过仪式都具有3个阶段: 隔离、中介、整合。在第一阶段, 人们从群体中退出, 开始从某个位置或地位, 朝向另一个位置或地位移动。中介阶段是出于两种状态的一段时期, 中间模糊地带, 人们已离开了某个地方或者地位, 但是没有进入或者参与下一个 (Turner, 1974)。通过仪式往往都是集体性的, 出现集体中介状态, 被称之为集体中介性 (Turner, 1969)。通过仪式的中介状态, 产生出紧密地群体精神, 具有强大社会凝聚力、群体归属感。正在共同经历中介状态的人们, 形成了一个由同等地位者所组成的社群。无论是先前还是后来出现的社会身份区隔, 都被暂时遗忘。中介状态是每一种通过仪式的基本构件之一。更进一步地说, 在某些社会, 有些中介象征可能被用以将某个群体和其他群体区分, 以及

和整个社会区分开来。这类永久中介团体的最典型例子出现在复杂社会——民族国家。仪式提供了社会功能, 在人群中创造了暂时或永久的凝聚关系——形成一个社会群体。

2 作为仪式的体育

Susan Birrell在《Social Force》杂志上发表文章, 直接从社会人类学的视角研究了体育的仪式意义。他认为体育的起源总是与民间节日或者宗教典礼有关; 体育活动能够连接个人与群体的关系; 仪式化的体育具有重要的社会含义 (Susan Birrell, 1981)。

在重大的体育活动中, 除了进行着体育项目的活动外, 还包含着诸多国家象征意义的内容, 如国旗、国歌等, 而这些符号对于形成国家认同有着重要的意义。Joseph R. Gusfield和Jerzy Michalowicz在《美国社会学年刊》(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发表了《世俗象征: 现代生活中的仪式、礼仪和象征秩序研究》, 他们运用源于象征人类学的概念和视角, 对于现代生活的一系列重要研究, 涉及到象征行动和非象征行动的区别等问题。该文回顾了3个关于行为的主要研究领域: 1) 关于制度的研究, 特别是政治、法律和社会控制; 2) 关于仪式的研究, 包括生活圈仪式、体育和节日。3) 关于日常生活的研究, 包括消费商品和食物、以及大众文化。作者从对地点和维度的方法论辩论, 以及不同形式的象征分析中得出结论: 象征意味着对既存的事物赋予了新的意义。比如狮子代表力量; 国旗象征国家 (Joseph R. Gusfield和Jerzy Michalowicz 1984)。

Susan Birrell认为: 在涂尔干的理论中, 仪式过程本身是为了连接个体与道德共同体 (a community of moral order) 服务的, 虽然宗教仪式是一种神圣的行为, 但是具有世俗的意义, 例如美国将士阵亡纪念日 (Memorial Day) 的仪式意

收稿日期: 2008-07-02

基金项目: 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Y0104) 资助; 国家重点学科 (社会学) 重点规划项目成果之一。

第一作者简介: 董国礼 (1968-), 男, 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经济社会学。

作者单位: 上海市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大学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上海大学社会学系, 上海 200444。



义。戈夫曼的理论则更进一步强调仪式中的每一分钟都是个人观察和改变自身行为的互动过程。卢克曼认为这两个理论最大的区别在于：涂尔干关注的是那些特有的宗教仪式，并揭示它们的满足现实功能需求的意义，指导了个体如何去了解道德秩序；而戈夫曼则认为生活中的各种情景都可以被理解作为一种仪式，但是从这种互动中却能够产生道德/社会秩序。

对于这两种仪式的观念，可以用韦伯克里斯玛(charisma)的理想类型来沟通，即一个英雄的出现，既满足了仪式教化观众的功能，又在英雄的这种自我展示中重构了观众的理解。而体育借助媒体把运动员塑造成英雄，把(戈夫曼所说的)特定情景中的互动，拓展到整个公共领域。因此，体育倡导的一些价值，就在这种“仪式”中，传递为了公共的价值特征。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勇气(courage)——这是体育运动所特有的内在的特质，许多项目的运动员都具有不怕死亡或者伤残的勇气，例如斗牛、登山和赛车等等。而在足球、篮球、冰球等一般项目中，人们也总是试图通过暴力行为来表现男子气概。

比赛精神(gameness)——指运动员那种坚持不懈的精神，例如长跑选手在胜利无望的情况下仍然奋力到底，体操选手在多次摔到后仍然爬起来等等。此外，刚强也是一中表现形式。

正直诚实(integrity)——体育运动必须作到对于规则的遵守和维护，哪怕在别人不知晓的情况下。表现为自律、谦逊和勇于承认错误等等，这方面也会成为现代人的道德榜样。

沉着镇定(composure)——在紧张激烈的比赛中会遇到各种情况，运动员必须具备沉着出事的心智。最重要的就是：全神贯注、职业风范和场上自信。此外，对抗压力、冷静和如何面对伤病等等，都是人们关注的。而这种气质，会成为人们模仿的对象。

因此，运动员们是具有道德示范性的符号象征，群体的价值观容易在他们身上得到体现，他们也能够影响喜爱他们的人。“英雄崇拜”(hero worship)就是体育能够成为现代宗教仪式观念的代替品，甚至影响“无宗教信仰”的人们的共有价值的原因。

3 体育的社会整合功能

体育的象征意义表现在国家的展现和国家的认同上，同样作为仪式的体育，传递并倡导着一系列的公共价值观。再者，对于大众体育来讲，其象征意义使得人们的个性得到释放、达到自我价值的实现。

体育作为一种国家象征，能够实现国家内成员的自我认同，使得国家内成员的凝聚和整合。竞技体育，尤其是奥运会，比赛场也成为了国家符号充分展演的场所，成为国家利益、民族精神竞技角逐的地方。某些重大的比赛中的国家代表队，会成为整个国家人民共同关注的焦点。人们在为自己国家的运动员加油、呐喊，一起期待、一起庆祝的过程中，能够深刻的体会到国家共同体的存在，并且对其产生深刻的认同。特别是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小国家而言，他们的运动员参加国际大赛、并力争获取好的成绩，是他们展现自己国家、维系自己国家认同的重要手段。对于中国而言，要充分利用体育的象征意义，加强国

家和民族的认同、增强人们的凝聚力。特别是要抓住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契机，运用北京奥运天人合一、人文和谐的理念充分对外展现一个悠久历史、文明、富强和爱好和平的大国形象。同时要强调奥运全民参与的重要性，增进国民的自豪感和民族国家的认同，促进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和谐。

无论是仪式性的教化还是情境中的互动，作为仪式的体育，向大众传递着公共的价值特征和道德规范：勇气、比赛精神和正直诚实等等。体育作为一种大众喜爱、高度参与、高度模仿的互动形式，对于价值、规范的倡导，是一种效果广泛、影响深入的方式。友好、平等、自强不息的体育精神对于健康的社会价值观的塑造具有重要的作用。NBA联盟之所以要重罚场上斗殴的球员，就是因为NBA作为一个在全美国乃至全世界都有广泛影响力的体育联盟，必须要树立一种良好道德风尚。从普遍性的大众体育到高水平的竞技体育，从一般运动爱好者到专业运动员、著名的运动员，存在着一种模仿与被模仿的关系。所以对于中国而言，职业的体育赛事、体育联盟必须要有良好的竞争环境和道德风尚。比如，对于足球赛事中“黑哨”、“假球”等现象一定要严厉处罚、禁止。因为这些现象向大众体现的是“不正之风”，与利于和谐社会的价值观相背离。相反，体育的良好风尚，特别是那些优秀的运动员，起到了韦伯克里斯玛(charisma)的理想类型的作用。比如，姚明、刘翔，作为体育界的明星，就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转达了一种自强不息、平等友爱的精神。这些明星成为大众的模仿典范，宣传了主流的、良好的道德风尚，人们在观看他们的表现、模仿他们的过程中也吸纳了这些价值观并且内化于自身。所以说，把握好体育的仪式性的特点能够促社会良好风尚、促进社会的和谐。

对于大众而言，体育的象征具有多重性。一方面大众体育象征着自我实现、个性的释放和休闲时间的意义化。各个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人们会寻求不同的体育运动。青少年选择滑板、蹦极寻求刺激、释放个性；还有许多白领年轻人选择登山、越野、野营这些体育方式来体验野外的自由生活；中年人会选择舞蹈、高尔夫这些交际性的运动等等；而老年人则热衷于太极等养生的体育运动。不管是怎么样的体育运动，都为人们寻求工作以外的自我价值提供了方式。这些不同的体育运动为人们的休闲时间提供有有意义的消遣，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另一方面，大众体育有着符号消费的象征，体育消费也出现了布迪厄所说的文化“区隔”，即不同阶层的人们会选择不同的体育运动方式，不同的消费符号来显示其阶层的特征。正因为如此，体育的象征意义也导致了体育引领时尚的现象，人们往往热衷于对于体育符号的消费，这些被商业化后往往表现在体育与商业化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国应该发展多样化的大众体育，真正使得体育能够深入大众、满足各个阶层的人的需求。让人们能够接受、参与体育这种健康向上的休闲方式，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同时要防止体育过度的商业化、符号化，而使得体育本来所具有的自我实现、追求自由性质被异化。

4 体育的国家认同功能

体育的象征意义表现在国家的展现和国家的认同上。刘翔是中国运动员的骄傲，他在雅典奥运会上以12秒91的成



绩平了由英国名将科林·杰克逊保持的世界纪录。这枚金牌是中国男选手在奥运会上夺得的第一枚田径金牌，书写了中国田径新的历史！刘翔获得世界冠军后自然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既然是国家认同，那么国家就具有地方性、种族性，那么与国家认同相关联的就是种族自豪感的问题。芬兰学者 Mervi Tervo (2004) 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上发表论文，讨论了体育、种族与国家认同个的关系，在该论文里作者对于国家的观念（及其起源）有很多研究，但是都难以给出一个确定的概念，该文偏向于引用 Ernest Gellner 强调的两个要素：自主性 (voluntaristic) 和文化 (cultural)。即当两个人自主地享有相同的符号、仪式、历史和话语等文化内容时，他们会认同同属于同一个国家。由此，来界定国家的观念和民族主义 (nationalism)。

20 世纪初开始的国际性体育运动，尤其是奥运会，为国家主义者提供了很好的服务。国家队就成了国家的象征，由他们在国家公共范围内表现来提向国家的形象，并由此来区分“我们”和“他们”，体育是将国家群体 (national community) 连接起来的最好的方式。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国家话语在强调“我们或者我们的土地、人民和文化”与“他们”的差异时，并不足以建立国家形象和自我认同，因为相近的文化是具有包容性的。只有一个变量是可以确立这种认同的，那就是地理意义上的国家范围，只要是在这个范围内的公民，那么必定是这个国家的人，并以此来强化“我们”的认同——所以国家队的观念如此重要，都是这个国家的人。所以在国家认同问题上，体育运动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通过“体育英雄”和“国家胜利”能够确立并强化集体的意识和传统。

奥运会作为全人类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体育盛会，毫无疑问对于增进国家、种族认同有着重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诞生之初发展至今，奥运会已经成为一项具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多重效应的文化活动。由于各个民族、国家的高度参与，以及在全球的巨大宣传影响效应，奥运会成为一个各个民族、国家进行展演、交流的巨型舞台。从开幕式的进场、比赛、领奖等一系列的过程中，国家和种族的象征、文化得到展示，同时，这些也构成了国家与种族的认同。认同，是区分“我们”和“他们”的过程，界定自我是通过他人来实现的。在奥运会这种国际性的盛会上，人们通过国旗、语言、文化、代表队来区别彼此来获得自己的国家认同；同样，以肤色、语言、习俗等方面的差别来获取自己的种族认同。奥运会的参与都是以地域上的国家代表队来进行，这样就打破了文化相似性，而强调了民族国家的认同。

正因为奥运会有这样的魅力，因此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会积极地参与奥运赛事，并且力争好的成绩。这一方面是都看重奥运这个舞台对于展示国家形象、促进国家认同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取得优异的比赛成绩、获得奥运奖牌更是增强国家自豪感的重要方式。参赛国代表队获取成绩不仅仅是代表个人成绩的取得，而是整个国家竞争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体现。特别要注意的是，对于该国的民众而言，他们作为观众、加油者，在这些过程中能深深的体会到激情、胜利的喜悦和国家的自豪感。特别是领

奖台上本国国旗和国歌的展现，让人在热血沸腾的过程中深深的体味到国家与民族的自豪感。甚至，一些关键性奥运金牌对于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如：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首次参赛，徐海峰的第一枚金牌的获得不仅是中国奥运史上的重要一步，也是后来我国提升国家认同、培养国家自豪感的重要教育素材；1936 年的柏林奥运会，黑人欧文斯的四枚金牌则是向希特勒的种族歧视发出了最强大的挑战，为维护一个种族的荣誉作出了重大贡献。希特勒和纳粹极力想利用奥运会标榜日尔曼民族的优越，但杰西·欧文斯在奥运会上的表现赢得了全柏林人民的欢呼，他们不顾纳粹的威胁和禁止，勇敢的为欧文斯庆祝；刘翔在 2004 年希腊奥运会上以平赛会纪录的成绩获取男子 110 m 栏的金牌，这不仅仅为中国证明了短道项目上的实力，而且向全世界为亚洲人、黄种人证明了实力。

参加奥运会赛事有利于提升国家认同，赢得奥运会的举办权、成功举办奥运会则更是能提升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增进国民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首先，能获得奥运会的举办权就是一个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综合实力的体现，意味着国际上、其他国家和民族对于举办权获得国的肯定和信任。奥运会作为一项全世界最大的体育赛事，对举办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文明程度都有着高要求。同时，奥运会代表着和平、平等这些理念，举办国的成功也说明该国能体现出这一系列被全世界所认同的理念。早在 1908 年，有中国奥运第一人之称得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就提出，中国何时才能派一位选手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才能派一支队伍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才能举办奥运会？可以说中国获得 2008 年奥运会的举办权是国人百年梦想的实现，使得国民加深了国家的认同。由于奥运会能够给举办国带来经济、科技各个方面的巨大推动力，这能够增强国民对于国家的信心，民族的自豪感。

作为东道主，奥运会的举办国更能把握奥运会这一大舞台展示本国的文化、宣扬本民族的文明和理念。作为全世界参与和全世界瞩目的体育盛会，举办国更能展示出本国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同时，本国的国民通过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与其他民族文化的接触，很自然的能够反过来加深对于本国、本民族的文化认知和认同。在 2004 年雅典奥运会的闭幕式上，张艺谋就在短短的 8 min 内，用大红灯笼、武术和经典民歌“茉莉花”等来展示出中国的民族文化。这不仅仅是向世界各国展示中国的特色，同样另一方面通过这些符号也能加强国民对于中国的认同和共识。中国筹办奥运会的过程中，“舞动的北京”的中国印奥运标志、“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主体口号、金玉和璧的奖牌，都不仅仅体现了奥林匹克精神的实质和普遍价值观——团结、友谊、进步、和谐、参与和梦想，而且突出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主题。奥运会举办的意义远远超越了体育本身，向世界展示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共有美好家园，同享文明成果，携手共创未来的崇高理想，展现一个繁荣昌盛、和谐团结的国家形象；并且极大的增强了国家的认同和民族的凝聚力。

5 体育的国家自豪感功能

国家自豪感既包括对国家的仰慕，也包括自身利益与国家的休戚相关——人们感到与国家的成就和可仰慕的品质的某种类型的共享。对于国家自豪感的学术研究有：羞耻



感,即使是自豪感的缺乏,可能为破坏性、好斗的国际政治团体提供支持,也可能阻碍对外政策中的建设性协议。相反,另一种观点则指出,过于强烈的国家自豪感,可能鼓励好战和对外国人的仇恨与恐惧。尽管自豪感经常与国家的兴盛联系在一起,不过有观点也指出,它比国家产生得更早,也持续得更长。可能更多好斗的国家情感,被各种非竞争性的“忠诚”所缓和。关于人们有多大程度的国家自豪感,它在不同国家表现有何差异的问题,在全球化的议题中得到了新的紧迫性(M.D.R Evans & Jonathan Kelley, 2002)。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体育成为了增进国家自豪感、塑造民族精神的一种重要的方式。特别作为是现代体育,已经深深地打上了国家的烙印,成为国家用来加强国家、民族认同、提升国家、民族优越性或者自豪感的重要手段。体育的这种功能是由体育的多重性质所决定的。体育的象征性和仪式性使其与国家的形象和利益紧密结合起来,成为国民共享利益的一种方式。虽然体育活动也是全球性的,在高水平的体育竞技项目,大多数运动员或者代表队都是代表着国家的形象。正因为体育同时有着全球性和国家性,国旗、国徽、国歌在体育中的使用都是国家符号的展演,国家认同的基础。同时代表队的出场、颁奖典礼时国歌、国旗的展示,这些体育的仪式性将运动员的比赛和胜利紧密联系起来。在比赛的时候,运动员和观众由国家联系起来,同一个国家的观众为该国运动员一起加油呐喊,并且一起分享胜利的喜悦,这时就产生了作为该国国民的一种自豪感。

与国家自豪感密切相关,也是因为体育成绩已经成为一种国家利益、国民共享的利益。在奥运赛场上,许多国家都渴望取得优异的成绩、获取奥运金牌,从而来展示国家的整体实力、提高国际形象,从而对内增加国民的国家自豪感,塑造民族精神。奥运会作为一项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参与竞争的体育赛事,优异成绩、领先地位的取得,自然就提升了本国的优越感和自豪感。我国自1984年参加奥运会获得首枚金牌以来,每次奥运成绩都有进步,每次都会给国人带来喜悦和自豪感。运动员的表现跟国家自豪感紧密相关。运动员的表现不仅仅指运动员所表现出来的竞技水平和取得的成绩,而且包括在体育运动中表现出的奋斗精神、竞技风尚和爱国情怀。当奥运健儿发出“为国家争光”的口号,当身披国旗的奥运冠军喜极而泣时,作为同一个国家的观众也会深感自豪。姚明、刘翔等运动员的成功就被认为为国争光,中国人因此而感到自豪。媒体对于体育运动、体育明星报道的倾向性也会使人们产生国家自豪感。媒体往往也会用“为国争光”来形容优异成绩的取得,“国家的骄

傲”来形容优秀的运动员。中国举办的2008年奥运会也大大提高了中国人的国家自豪感、塑造出充满自信的民族精神。因为这次奥运会,中国作为东道主的角色,将这次奥运会打上“中国”的烙印。2008奥运会尽情展现出了中国的民族文化,而这种“主场”意识将会给国民更多的国家自豪感和归属感。

当然要注意的是,这种国家自豪感也有可能导致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在体育运动中,对于国家自豪感的过分扩张有可能会产生对其他国家的歧视,或者在与其它国家的比赛时产生过于激烈的对抗。这会使得比赛过分脱离了本身的性质,成为了国家之间“另一种形式的对抗”。纳粹德国还利用这种体育所带来的国家自豪感大肆宣扬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给奥运会带来破坏,挑起世界的矛盾。另外,过分强调体育对于国家自豪感的重要性会给运动员带来沉重的压力,体育本身含义的异化甚至危及到运动的生存。哥伦比亚的足球运动员埃斯科巴因为在1994年美国世界杯的比赛上打进乌龙球,而被国内的激进球迷枪杀。

参考文献

- [1] Conrand Phillip Kottak. 文化人类学[M]. 徐雨村译, 美商卖格罗. 希尔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 2005
- [2] Barrie Holihan(1997).Sports, National Identity and Public Policy [J]. *Nation and Nationalism*, 3(1), 1997,113-137.
- [3] Joseph R. Gusfield, Jerzy Michalowicz1.(1984). Secular Symbol: Studies of Ritual, Ceremony and Symbolic Order of Modern Life [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10 , 417-435.
- [4] Leach E.(1976).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M].105.
- [5] Mervi Tervo(2002).Sports,'race'and the Finnish national identity in Helsingin Sanomat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J]. *Nations and Nationalism*,8(3), 335-356.
- [6] M.D.R Evans & Jonathan Kelley,(2002).National Pride in the Developed World: Survey Data from 24 Nation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Vol.14, No.3.
- [7] Susan Birrell.(1981).Sport as Ritual: Interpretations from Durkheim to Goffman[J].*Social Forces*,Vol.60,No.2:354-376.
- [8] Turner, V.W.(1969).Ritual Process,Chicago,Aldine, 204pp.-1974,Dramas, Fields and Metaphors: Symbolic Action in Human Society[J].*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309.

(责任编辑: 陈建萍)